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实质

王传剑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工商管理系,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以总体对外战略为指导, 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历来都表现为一个体系, 而这一体系则始终都包含两个基本层面: 其一是针对半岛国家本身, 其二则是针对半岛周边大国。冷战后, 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不仅是维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所必需, 而且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也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实施中一个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美国对外政策; 朝鲜半岛; 双重规制

中图分类号: K312;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4721(2004)02-0076-10

伴随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 被称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相适应, 半岛问题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而作为该问题关键环节的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则尤其引起了广泛关注。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研究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 远未达到真正完善的程度。实际上, 如何在总体上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作出更为系统的论证仍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历史是一面镜子, 是通向现实的桥梁。在这里, 对美国关于朝鲜半岛政策的粗线条历史考察, 不仅可以再现其发展脉络, 而且构成了分析和研究冷战后美国关于朝鲜半岛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历史, 蕴涵着对现实的启示。

一

从地理上看, 美国并不是一个东北亚国家, 但它却是西方世界中最先对朝鲜半岛发生兴趣的国家之一。早在 1832 年, 美国东印度公司就曾派遣商船进入朝鲜黄海、忠清两道沿岸, 要求订约通商。1834 年 5 月 13 日, 美国派往朝鲜进行实地考察的特别事务官在向国务卿汇报时, 也极力肯定进入朝鲜的价值, 认为朝鲜具备成为侵略亚洲大陆的战略基地以及向

东北亚进行经济渗透之前哨据点的条件。而在 1845 年 2 月 12 日, 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普拉特还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开放朝鲜的议案》, 宣称“这个一向隐遁的国家的港口和市场, 对我国商人和海员的事业欲形成刺激的时代已经到来”。^{[1](P111)}

之后, 伴随日本的开国, 美国对朝鲜的野心也日益显露。从 1866 年起, 朝鲜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参众两院的重要议题。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甚至公开宣称, 要在亚洲大陆建立联络点, 即类似于殖民地领土那样的地方。与此相适应, 美国舰船入侵朝鲜的事件开始迅速增多。1865 年 8 月, 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舍门将军号”入侵朝鲜内河被焚事件。不久, 美国以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为借口, 拉开了大举入侵朝鲜的序幕。1867 年 1 月, 美国军舰“瓦秋塞特号”停靠于朝鲜黄海道长渊某港口, 收集情报、测量水深。1868 年 4、5 月间, 又发生了盗掘大院君生父南延君坟墓事件以及美国军舰“申南道阿号”入侵朝鲜水域事件。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和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部甚至密谋了一个美、法军队联合入侵朝鲜的计划。1871 年 5 月, 美国舰队大规模入侵朝鲜, 此即朝鲜史书上所称的“辛未洋扰”。

到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的远东政策开始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如果说威廉·西华德任国务卿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是“与同种族的欧洲人合

收稿日期: 2003-10-25

作者简介: 王传剑(1971—), 男, 山东肥城人, 法学博士,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作”，^{[2](P107)}共同侵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美国则已“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了与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的政策。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正是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3](P454)}

1876年2月《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人“从日本的胜利中看到了使美国得到一个条约的机会”。^{[4](P24)}1878年4月，海军提督薛菲尔受命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日本的友好援助，与朝鲜立约”。薛菲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像佩里开放日本那样，作为“隐士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载入史册”。但是，美国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此时日本对朝鲜的影响，而薛菲尔在与日本的进一步交涉过程中，也日益感到“日本并无诚意使朝鲜向世界开放贸易，日本人只是为利己的目的所驱使，操纵着交涉”。^{[3](P45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改换对朝交涉的渠道，转而寻求当时仍与朝鲜保有宗藩关系的清政府的支持与协助。为达到目的，薛菲尔一面与李鸿章等人积极接触，一面则不时以“如果朝鲜不同意美国签订条约，那么日本就会使朝鲜彻底地屈从于它的统治”^{[5](P90)}之类的话相威胁，并最终促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于1882年5月20日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美国也因此成为西方列强中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该条约的签订，极大地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并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该条约对朝鲜和东北亚地区近代历史的影响，几乎与《江华岛条约》同样深刻。由于“美国国务院和日本政府一样，也认为中国是美国侵入朝鲜道路上的障碍”，^{[5](P91)}因此中国方面所坚持的朝鲜乃“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最终未能体现在条约文本之中。而美国则顺利地取得了在朝鲜的通商、领事裁判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清政府的目的原本是要在确保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的基础上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但它根本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更没有意识到美日勾结正在形成。实际上，通过朝美条约的签订，美国不仅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给了日本以积极的援助”。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扬·约翰所言，“我们在朝鲜所做

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6](P96)}

伴随日本奴役朝鲜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争执日趋激烈，双方反复折冲，并几近战争的边缘。对此，美国政府虽然训令其驻东京和北京的代表尽力缓和两国间日益增长的积忿，但它却一直坚持朝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政策，而且在其所谓的“调处”中明显偏袒日本。对此，就连日本方面也承认，“美国的对朝政策就效果来说显然是对日本友善的”。^{[3](P402)}这一时期，“英国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方方正正地挡住日本实现它的对朝鲜计划的去路”，而“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帮助已经不亚于一个同盟了”。^{[3](P408)}这种情况，在其后的中日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当中日战争即将爆发而朝鲜在无奈之下向美、英、法、俄等大国求援时，美国丝毫没有想联合中国和欧洲诸强在朝鲜对抗日本的意思，只愿意在保持“公正的中立”的基础上，以所谓“友好的方法”影响日本。而当《马关条约》签订引起俄、德、法三国联合干涉而日本积极谋求联合美、英、意的“反干涉”时，美国政府却同意对日本“予以援助”，并“劝告中国政府从速批准媾和条约”。当然，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如美国所愿。日本最终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于中国，其大陆政策也由扩大“利益线”退回到保卫“生命线”。

从本质上说，日俄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北进政策”和俄国帝国主义“远东政策”相抵牾、相冲突的产物，但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方面的态度和政策却尤其值得回味。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曾先后4次贷款给日本，总数达1.5亿美元，相当于战争期间日本获得贷款总数的44%，是日本战争经费总数的22%。对此，当时的《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日本的战争计划就会破产，就不可能进行战争”。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举借外债，乃是这次战争的一大特征”。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是在为我们而战”的观念充斥于美国政界人士的头脑之中，他们对日本一切侵朝的行动都给予了全力支持，而其典型实例之一便是美国同日本于1905年7月29日签订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通过该协定，美日之间作了一笔重大交易：日本宣布对美属菲律宾殖民地“不抱有任何野心”，而美国则同意日本“在朝鲜建立宗主权”。^{[7](P112-114)}这个臭名昭著的协定是20世纪初美日两国在亚洲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协定，这意味着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一切“行动自由”，也即实行残暴殖民统治的“自由”。

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开始担心日本在击败俄

国占领满洲之后,会威胁美国的远东利益,甚至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为此罗斯福专门向日本提出警告说:“从一开始我就支持日本,而且已经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如果日本谨慎行事,处理得当,它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的领导者之一,但如果它很狭隘,不随和,利用战争胜利与其他国家作对,取得比它应该得到的更多的利益,那么它面对的将是一个联合的世界,它将不可能成功。”^{[7](P160-161)}基于这种思想,罗斯福终于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调解日俄战争,并敦促双方通过和平谈判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但是,这一和约的签订,使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均势,被日本独占的局面所代替。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关于并吞朝鲜的条约,朝鲜“完全而且永久地”出让“有关全部韩国的一切统治权”。至此,日本吞并朝鲜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朝鲜则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的所谓“合作”政策,在吞并朝鲜进而称霸亚洲大陆的道路上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美国却为所谓不以“感情用事”而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逻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马士、宓亨利所言,虽然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本身是“美国人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只能间接负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政策是同朝鲜的独立一起葬送了”。^{[8](P738)}

应当承认,美国在对待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与其与日本之间关系的性质为转移的。这就是当彼此之间互有所求时,美国会以牺牲朝鲜、通过确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来“取悦”日本;而当双方矛盾激化时,美国又会以提倡“民族自决”的形式给朝鲜独立运动以一定程度的支持。如果说前一种情况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朝鲜问题的“主导”政策的话,那么第二种情况则在二战期间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

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美国开始对朝鲜的反日独立运动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一时期,朝鲜“革命巨子”安昌浩、独立运动领袖金九以及李承晚等人也都曾旅居美国,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活动,美国也因此成为继中国、苏联之后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基地。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展,罗斯福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处理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问题,朝鲜的前途当然也包括在内。1943年3月27日,罗斯福曾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讨论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任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

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9](P658)}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向斯大林解释了托管问题,认为“朝鲜人民还没有能力实行和维持独立政府,他们应置于四十年的监护之下”。^{[10](P97)}在达成这些共识之后,12月1日发表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我三大国珍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11](P316)}不过,明眼人一看便清楚,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在相当期间内”的措词。很明显,从其战略利益出发,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大国单独控制朝鲜,而它自己又不愿在朝鲜承担过多的责任以至投入过多的力量,于是以延缓朝鲜的独立为代价实行国际托管,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朝鲜半岛的局势证明是在朝着与美国的意图与设想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美国原想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但赶不上苏军向朝鲜半岛推进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斯大林一封密信,信中建议苏军接受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日军投降,美国接受三十八度线以南日军投降,斯大林没有表示反对。后来,在盟军给日本的“总命令第一号”中,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据此,美国军队于1945年9月8日在仁川和釜山登陆,迅速占领朝鲜南部并于10月把李承晚送回汉城,指定他为朝鲜“最高统治者”。而与此同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组织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1948年8、9月间,美国和苏联分别支持的南北朝鲜两个独立的、也是对立的政权先后成立,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最终形成,“三八线”也由此成为南北朝鲜两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法定”分界线。

二

如果说美国在朝鲜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并没有成为一个决定性力量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则无疑使其获得了这种机会。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历史中,美国不仅与苏联一起共同“造就”了半岛的分裂,而且由于长期的美韩同盟和美朝对立,使半岛的分裂结构变得日益巩固。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朝鲜半岛冷战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朝鲜战争无疑成为美国政策演变的标志和分水岭。

战后不久,在美苏之间就建立什么样的朝鲜临时政府而展开激烈争论的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在朝

鲜半岛对于美国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虽然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的官员们从美苏冷战的大格局出发,认为朝鲜半岛“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了这场斗争”,^{[12](P380)}“朝鲜犹如东西方之间在远东争夺势力和影响的缩影,象征着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制度竞赛,因而无论朝鲜在军事上是否有价值,支持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朝鲜政权在政治上是十分重要的”。^{[13](P784-785)}但由于受二战期间形成的“欧洲第一”观念的影响,美国军方人士则坚持认为,在未来的东西方对抗中,如果失去西欧,美国将很难保全自己,“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14](P620)}因此“从军事安全利益考虑,美国几乎没有必要在韩国派驻军队、设立军事基地”,“韩国在未来远东的对抗中微不足道,从坏处着眼,它是我们军事上的一个大包袱”。^{[15](P817)}

由于军方与国务院的观点相持不下,以至于围绕该问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时日。直到1948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第8号文件才得以出台,^{[16](P1163)}但这一文件所采取的显然是一种折中路线,即:既能早日脱身,又不背弃承诺;既要适时撤军,又得保障“新生政权”的安危。它也因此成为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收缩计划的开端。在这之后,由于“供电危机”的出现以及南朝鲜局势混乱,美国曾一度延缓撤军,并对朝鲜半岛政策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1949年3月,在国务院的要求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2号文件追加了补充条款,促请国会立即批准援韩的三年计划,同时明确规定1949年6月30日为最后撤军期限。至此,“NSC-8/2号文件为由来已久的撤军之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7](P969)}1950年1月,在美国新闻俱乐部的聚会上,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讲话。他宣布,美国在太平洋需要守住的是一条环形防线,这条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开始到日本列岛,然后通过琉球群岛(冲绳)延至菲律宾。这样一来,在美国远东安全格局中朝鲜半岛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给美国的这一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

在美国看来,朝鲜战争并不是局部性的现象,而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南朝鲜落入苏联手中,不仅是美国在东亚的损失,而且将对其全球战略造成巨大的损害”。^{[18](P281)}按照美国的政策逻辑,如果听任社会主义的朝鲜击败韩国,那就可能出

现东亚“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有可能导致欧洲“多米诺骨牌”现象的同时出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原本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朝鲜半岛,突然之间又被纳入美国必须承担最主要义务的范围之中。为此,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15个国家的兵力,动用了其1/3的陆军、1/2的海军和1/5的空军,并以支出200亿美元直接战费的代价,与中朝之间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其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体系的活动。1951年1月4日,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在就美国拟定的《太平洋公约草案》发表意见时强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条防线显然超出了艾奇逊1950年1月提出的美国防务范围。8—9月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一起构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军事体系的重要环节,并初步确立了对亚洲大陆新月型的包围态势。

1953年10月1日,华盛顿在得到汉城方面放弃“武力统一”的确认之后,订立了韩国“梦寐以求”的共同防御条约。如杜勒斯所言,该条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明白无误地表明美韩共同抵御任何外来军事力量的决心。可以说,这一同盟的建立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其政治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韩国纳入了美国的东亚安全体系之中,使其成为美苏冷战在东北亚的战略前沿,从而也决定了整个冷战时期朝鲜半岛的基本战略态势。从此,美韩同盟互助与美朝敌视对立一起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根本特征。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履行条约义务、显示美国的威慑作用,美国在韩国驻留了一支数量不小的军队,并配有大批的重武器。它为韩国的国防现代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援助,并从根本上增强了韩国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9年,美国在军事装备、军火供应、后勤服务等方面共援韩3亿多美元,占到了美国同期对东亚援助总额的27%。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经历也使美国认识到,对韩国来说,单一的军事援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施以全面的经济援助,唯有双管齐下才能挽救韩国这位“伤痕累累”的小伙伴。据统计,从1946年到1976年,美国向韩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超过了127亿美元。这一时期,韩国是亚洲国家中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接受的军事援助也仅次于南越而位居第二。^{[19](P18-19)}这样,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输血”双

重手段,美国在朝鲜半岛扶植了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又忠诚听命的合作伙伴,并使其成为遏制苏联、屏障日本、捍卫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利益以及维持东亚均势的有力保障。对美国来说,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不仅阻止了朝鲜半岛爆发新的战争,保证了韩国的安全,而且成功地遏制了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图谋”,从而维持了东北亚局势的相对均衡和稳定。

与此相对应,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由于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旗手”与韩国订有同盟关系,而朝鲜则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因此在整个冷战时期,美朝关系都处于一种相互敌视对立的状态之中。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军事冲突也屡有发生。据统计,仅在1967和1968两年间,军事分界线附近就发生各类冲突1769起,其中260起被美国认为是“重大事件”。^{[20](P10-18)} 这些事件虽然都通过双方的接触与谈判得以解决,但却引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军事对抗,并每每走近战争的边缘。大约从70年代开始,伴随美苏缓和、中美接近、“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的朝鲜政策也出现了某些调整的迹象。在民间领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美籍朝鲜人)得以到朝鲜访问,而朝鲜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派员到美国。据统计,在1971到1978年的8年间,只有8名学者和15名其他人员得以到朝鲜访问,而在1979到1981年的3年间,这两个数字就分别达到了19人和33人。^{[21](P118)} 在官方层次,美国的政策调整主要来源于基辛格所谓“交叉承认”的构想。按照基辛格的表述,“如果北韩和它的盟国与韩国改善关系,美国也将会改善它与北韩的关系”。^{[22](P174)} 当然,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交叉承认”构想无法获得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美朝关系的些许改善,也只是作为敌视对立主基调中的一些小插曲而已。在1987年11月29日韩国民航客机被炸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开始把朝鲜归入所谓“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列,致力于改善美朝关系的所有努力也因此中止。

三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进入了一个根本的转型期。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战后40多年的冷战体制的最后终结。不过作为一种体制,冷战的效用是具有延续性的,其能发挥的功能也将是长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所有派生现象的终结。在东北亚,作为东西方冷战的

重要区域之一,虽然美苏冷战的大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与高度对峙的状态却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一方面,半岛分裂局面继续延续,南北双方依然高度对峙,紧张形势并未得到缓解。在面积仅有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上,朝韩双方部署了175万正规部队和大约100万准军事部队,其中70%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前沿阵地上,再加上3.7万驻韩美军的存在,朝鲜半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兵力部署最为密集的地区。对此,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承认,板门店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地方,这个横跨三八线的村镇成为冷战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定时炸弹的引爆器。”^[23] 正是这种严重的军事对峙,使得朝韩双方都视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彼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就自然而然。自冷战结束以来,南北双方之间的突发事件可以说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从1993-1994年的“核查危机”,到1995-1996年的“停战协定危机”,再从1996年的“北方潜艇事件”,到1997年的“三八线火并事件”,每一次事件都牵动了世界的神经。而在这之后,更是发生了1998年的“导弹试射危机”与“北方渗透事件”,以及1999年的“黄海危机”。在历次危机当中,南北双方依然互不相让,并每每走近战争的边缘。虽然这些危机只是导致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并没有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大战,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南北双方的紧张关系也并未伴随两极体制的终结而得到彻底缓解。

另一方面,朝鲜国内形势恶化,“朝鲜问题”复杂化,朝鲜的前途呈现诸多不定之数。伴随冷战的结束以及传统外部支持的减弱,朝鲜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困难。据韩国银行推测,自1990年以来,朝鲜的经济规模在急剧缩小,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在1995年为-4.6%,1996年为-3.7%,而到1998年,朝鲜GDP已经连续9年负增长。^{[24](P38)} 长期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制约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朝鲜在同韩国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加大了国家政权所受到的威胁感。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力量均衡在根本上是作为美苏两极力量均衡的一种具体体现。虽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和平”之中,但南北方之间的力量均衡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对维持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冷战的结束,传统的

美苏两极均衡和朝鲜半岛南北方均衡不再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南北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因素的强力约束之后,由于自主意识的增强,有可能在对朝鲜半岛发展态势的判断上变得越来越“无章可循”,这一方面会使相关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之中提升了未来危险的系数。

自南北分裂以来,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战略格局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的格局式样是典型的美、日、韩“南方三角”对抗苏、中、朝“北方三角”的话,那么在7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东北亚战略格局曾一度被置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之下,而到了80年代,更进而形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美苏中日四边形框架。^{[25](P52)}如今,冷战的终结虽然使长期以来两极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但并未根本改变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命运。与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多极化趋势相适应,东北亚地区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美、日、俄、中为战略四角的多极结构,围绕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变得更为复杂。毋庸讳言,美、日、俄、中四大国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新的战略四边形结构在根本上所依赖的仍然是一种权力均衡机制,只不过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已经不再是冷战体制之下的两极均衡,而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而实现“效用交叉”的一种新的多极均衡。权力均衡理论在很多方面含有强权政治的意味,这也是它何以在诸多理论者笔下每每被回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容否认的是,至少从现在来看,在朝鲜半岛这一最为特殊的国际战略区域内,权力均衡机制仍然保有其存在的价值。按照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说法,“势力均衡是保持该半岛和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什么时候均势被破坏,什么时候四大国就会兵戎相见。因为它们在朝鲜半岛都有利益,也因为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性”。^{[26](P182)}

从冷战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诸多外部因素当中,美国的参与显得最为积极、也最为活跃,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半岛未来走向的最关键因素。实际上,就冷战后十几年的发展情况看,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经逐步形成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适应,而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层面:其一是针对朝鲜的层面,目的是“规制”朝鲜,消除“朝鲜威胁”;其二则是针对半岛周边大国的层面,目的是“规制”相关大国,消除任何一个国家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企图。正是这两个层面的相互联系与相

互作用,决定了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系统结构。

一方面,在冷战后美国针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思维当中,“规制朝鲜”是其最直接的政策目标,也是其整个政策体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总起来看,冷战后的美朝关系,是围绕着朝鲜半岛出现的几次危机而展开的。而所谓“核问题”和“导弹问题”的存在与延续,则构成了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基于对所谓“朝鲜威胁”的强烈关注,美国在现实的对朝政策中所采取的是一种被称为“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两手策略。虽然这一政策选择在实际上表现为一个逐步调整、逐步演化的过程,但就整体而言,“遏制中的接触”与“接触中的遏制”事实上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最基本脉络,它也因此成为我们分析冷战后美朝关系时最为“显性”的线索。就“核问题”而言,尽管1994年《核框架协议》的签署可以视为美朝双边关系中的一项重大成果,但作为美国政策主要关注点的朝鲜“核问题”却远未获得真正的解决。在就该问题的反复交涉过程中,美朝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既相互敌对又彼此妥协、既频繁坐于谈判桌前又每每处于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而就“导弹问题”来看,美国的对应措施也基本上是同时沿着两条主线而展开的:一方面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朝鲜接触,试图说服朝鲜最终放弃导弹开发与出口计划;另一方面则以开发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积极措施”为手段,持续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以迫使朝鲜“就范”。可以说,正是在这两大问题的逐步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美国式的“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两手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其所谓“软着陆”的内在本质也得到了最为真实的体现。不难看出,在“遏制”与“接触”两手策略的“彼此交叉”与“相互交替”中,美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规范、制约朝鲜的行动,显然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消除对自己安全利益的一个“威胁”,又加强对半岛事务的干预能力。作为一种“显性目标”,它构成了冷战后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第一层面。

另一方面,在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针对大国的层面仍然是其核心和基础。因为在它看来,大国关系的状况如何,是决定其“世界秩序”能否顺利构建的关键之所在。与此相适应,在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中,作为对半岛地缘政治现实的一种必然反应,应对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的挑战”已经被视为消除“朝鲜威胁”之外的另一核心目标,而其基本策略则同样是所谓“霸权规制”与“多极制

衡”的结合。

大致说来,冷战后美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大国政策基本上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其中既有“利用”的一手,又有“限制”的一手。它一方面尽量谋求各大国对其朝鲜半岛政策的支持与合作,以便按照它的意志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另一方面则凭借其超强实力对各大国进行遏制,并借助海外平衡和多极均势限制各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作用的发挥。对中国,美国的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目标、两种策略”。所谓“一个目标”,就是促使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避免中国“破坏”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规划。而所谓“两种策略”则是一方面利用中国对朝鲜半岛特别是对朝鲜的影响力,鼓励其发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正面”作用;一方面限制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最大限度地抵消其有背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尽可能以朝鲜半岛作为战略前沿牵制与遏制中国。对日本,美国的政策是充分利用美日同盟对日本来说既是“保护伞”又是“枷锁”的双重性质,通过联盟自身功能的发挥对日本的作用进行有效的限制和尽可能的利用。以反对共同的“威胁”为借口,美国成功地促使日本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采取了同其“遏制”与“接触”相结合大体一致的政策步调。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中、朝、韩等国对日本固有的防范情绪,尽可能将其活动约束在同盟之内,以限制日本的独立自主能力,确保自己朝鲜半岛政策的顺利实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的目标是长期控制和利用日本,而绝不容许日本挑战或分享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已经不再把俄罗斯仅仅看作是一个“配角”。在它看来,俄罗斯通过努力已经逐步恢复了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半岛未来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中,俄罗斯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其地位也将是不可替代的。对美国来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继续“重视”俄罗斯这一政策取向包含着两个基本层面:其一是抑制俄罗斯势力的进一步增长,防止俄罗斯谋求主导朝鲜半岛事务的企图;其二则是尽可能利用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现有影响,使俄罗斯力量的发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美国的东北亚地区战略。可以说,伴随“利用”与“限制”这策略性两手的交替运用,美国的真正意图,就是要确保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美国主导”,进而建立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其霸权利益的东北亚秩序。作为一种“隐性目标”,它构成了冷战后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第二层面。

必须看到,美韩同盟的维持与发展是冷战后美

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其政策目标赖以实现的一个根本保证。美韩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基于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27](P13)}而产生的。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联盟,而是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维持地区实力均衡的工具和“调节器”。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美韩同盟虽然经历了一个角色不断调整和功能不断转化的过程,但它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却依然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冷战后,遏制朝鲜“威胁”与维持地区“稳定”成为美韩同盟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两个最主要依据,也是其极力谋求发挥的两个最主要功能。在这两大功能当中,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延续和继承,那么后者则实现了现实的发展与超越。与此相适应,针对“大国挑战”的层面与针对“朝鲜威胁”的层面一起,成为冷战后美韩同盟的两个主要政策指向。当然,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两个层面在实际的政策运作过程中的表现并不相同,与遏制朝鲜这一更为“显性”的目标相比,规制周边大国只能作为一种“隐性”目标而存在。不过尽管如此,美韩同盟(以及驻韩美军)毕竟在事实上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因此成为美国追求其半岛政策目标、进而实现其亚太安全战略的一个主要工具。

四

在展开整个课题之前,笔者一直抱有这样一种观念:朝鲜半岛问题作为政策研究的客体必然有其固有的内涵,而其地缘政治“命运”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延续性。同样,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虽然历经各个时期的发展,但其体系和结构在整体上也应该有某种历史的脉络可循。现在,在完成了这一“历史考察”任务之后,作为一种总结,笔者有意再次强调以下三点:

(一)关于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半岛当地居民中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谚语,即:朝鲜(半岛)是“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28](Pv)}这种描述虽然过于表面化,但显然是理解问题的基础。在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可谓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东北亚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是地缘政治的连接带、东西方文明的连接带和体制不同国家的连接带,而朝鲜半岛则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经济发展的失衡点和安全机制的空白点。无独有偶,美国的一位学者曾把朝鲜半岛比喻为“东亚的巴勒斯坦”,^{[29](P3)}而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其《建设和平与民

主》一书中则将朝鲜半岛视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26](P173)}显然,相对于美、日、俄、中四大国,朝鲜半岛无论就国土面积而言,还是就国际影响力、经济规模以及军事实力来看,都无疑是一个小国。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就像一只怯生生的触角,神经过敏地长在大国的身边,因此就变成大国间冲突或平衡的温度计”。^{[30](P16)}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状况和“夹缝”式生存条件,朝鲜半岛不仅不可避免地成为美、日、俄、中四大国利益的交叉点和汇集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直接影响四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朝鲜半岛还是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东亚“隐士之国”,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特征却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而且在此之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强权政治之下东北亚国际纷争的矛盾焦点。

与此相适应,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历来都表现为一个体系,而这一体系则始终都包括两个大的层面:其一是针对半岛国家本身,其二则是针对半岛周边大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层面曾经有不同的侧重,但其政策结构却始终如此。就冷战后的现实情况看,针对“朝鲜威胁”和“大国挑战”的“双重规制”是美国半岛政策的两个最基本层面。尽管这两个层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有所谓“显性”和“隐性”之分,但却都是美国半岛政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美国决不会因为某一阶段过分关注“朝鲜问题”而忽视来自大国的挑战,也决不会因为某一时期集中处理大国关系而无视“朝鲜问题”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基于对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视,美国从没有掩饰、也从没有放弃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谋求,但在具体的政策运作方面,却往往表现为两种策略的交替:当周边国家力量相对弱小时,它会试图以强力控制该半岛,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而在周边国家力量相对强大时,它又会奉行某种均势政策,有时甚至将朝鲜半岛视为大国交易的筹码,以获得某些更为重要的利益。很明显,前者是近代初期美国半岛政策的真实写照,后者则在日俄战争期间得到了初步尝试。冷战后,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霸权规制”与“多极制衡”的两手策略也由此得以全面体现。

众所周知,在有关朝鲜半岛政策的美国官方文件、期刊著作乃至政界人士的讲话或谈话中,“和平”与“稳定”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美国

最“鲜明的旗帜”和最“响亮的口号”。但是,在美国坚持以自己的思维与方式推行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同样,尽管美国冷战后不断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其“和平”旗帜与“稳定”口号“润色”,但只是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实施中的一个手段和一项策略罢了,而且所有这些概念表象也都不可能掩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实质,这就是以规制朝鲜和规制周边大国的双重手段,力求主导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构建以它为主体的东北亚安全机制,进而确保其整个亚太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始终是以其国家对外战略为指导的,并且完全服务于该战略。在这一点上,如果说近代历史是以开拓海外市场、夺取殖民地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在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朝鲜半岛政策就被纳入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遏制共产主义和争夺世界主导权为总体目标的全球战略当中,并成为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战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全球战略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如何阻遏苏联军事力量的扩张”,而其手段则是在欧亚大陆两翼经营好与西欧和日本的联盟,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并与之展开全面的对抗。^{[31](P127)}在这一方面,由于朝鲜半岛是位于亚洲大陆东边的一个“阵地凸角”,连接着东亚边缘外的连串岛屿,韩国东海和东南部的大韩海峡则控制了连接苏联远东基地海参崴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不但直接维护日本的安全,同时也控制了苏联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战略区域,因此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一方面构成了“阻遏苏联共产扩张政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也是“维系日本安全最有利的保障”。^{[26](P175)}与此相适应,被布热津斯基视为“要害国家”^{[32](P47)}的韩国则在实际上“既是一个前线国家,又是一个集结地域”,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和保卫日本的一个战略前哨”。^{[26](P175,184)}在美国看来,“亚洲特别是东北亚是我们这个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力量间的相互影响地区”,^{[33](P175)}“为了保护美国在日本的安全利益,美国无法忍受共产势力控制朝鲜半岛”,因此“防卫韩国”就成为其“在东北亚对苏基本战略重要的一环”。^{[30](P15,108)}借助于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美国事实上主导了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南方三角的建立,并在客观上维持了以半岛南北分裂为基础的东北亚战略均势。

冷战的结束和强大对手消失,“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

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34](P13)}而其全球战略也随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调整。围绕着确保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实现美国的霸权利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这一中心，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规范世界上所有国家有损美国全球利益的一切“不规则”现象、制约其他国家任何谋求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企图则成为这一战略的最基本内涵。必须看到，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通过一个明显由它自己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实现，而所谓“全球规制”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双重的规制”：一方面试图“规制”有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大国，以确保这些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对其全球主导地位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是要设法“规制”所谓的“无赖国家”和地区性“不规则现象”，以避免其全球霸权利益受到损害。为此，它一方面将政策重点置于朝鲜、伊朗、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另一方面则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俄罗斯等所谓“不负责任的大国”。从其全球利益出发，美国既不允许世界上再出现任何一个能向其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不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地区霸权。当然，地区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真正支撑点。作为其亚太战略的核心部分，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目标的。而基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朝鲜半岛又“责无旁贷”地成为美国东北亚战略实施的关键。于是，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就不仅是维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所必须，而且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实施中一个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如果单从理论上讲，在所谓“朝鲜半岛问题”当中，朝鲜和韩国理应是核心主体，而美、日、俄、中四大国只是外部因素而已。但就实际情况看，“朝鲜半岛问题”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这一地理范畴，因为历史已经表明：离开了大国关系来谈论半岛问题的解决只能以脱离现实的理想论而告终。应当承认，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一直受到权利均衡的制约，大国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从来没有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刻。尽管在从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半岛国家本身也曾多次试图以自己的意志确定其历史发展方向，但这种自主意志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成为正确可行的选择，而且由于这种自主意志的分量和相关大国的利益谋求与战略企图相比显得过于弱小，因此在实际的政治历史发展进程中，半岛自身的力量从来没有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只能作为在根本上成为主导因素的大国

意志的陪衬而已。历史的反思已经对此进行了验证，而现实的考察更进一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从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安全问题，还是统一问题，不管是半岛和平的维持，还是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离开了大国的支持与合作，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句空话。既取决于南北关系，又受制于大国因素，作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它构成了朝鲜半岛问题的最根本特点，也成为半岛问题“特殊性”的关键之所在。

可见，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半岛问题已经被纳入了一种国际政治“合力”之中。半岛问题的解决将最终依赖于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两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朝韩双方的共同努力，半岛问题的解决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没有相关大国的积极支持，半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将这两种因素有机而且巧妙地结合起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才真正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半岛问题的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长期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被人为分裂的民族，不管彼此积怨多深，最终总是要实现统一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各个层次的力量能否在克服各种障碍的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力，也取决于这些作用力能否在实际的运作与整合过程中达到效用的最佳值，这也应当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与探讨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中心课题。

参考文献：

- [1] Nelson and Frederick. Korea and the Old Order in Eastern Asia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6.
- [2] Charles S. Campbe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M]. Harper and Row, 1976.
- [3] [美]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 [M]. 姚曾广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 II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 [5] [苏] 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 (1840—1949) [M]. 朱贵生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 [6] Tyler Dennett. Documents—American Choices in the Far East in 1882 [J]. Amet. Hist. Rev, Vol. XXX, No. 1, October, 1924.
- [7] T.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Japanese War [M]. Gloucester, 1959.
- [8] [美] 马士, 必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 [M]. 姚曾广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 [9] [英]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 (清算): 中册 [M]. 翟同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10]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社,1974.
- [11]方连庆. 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2][美]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M]. 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
- [13]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6, 1948.
- [14][美]威廉·曼彻斯特.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M]. 朱协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5]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6, 1947.
- [16]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8, 1948.
- [17]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7, 1949.
- [18]Steven Hugh Le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M].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任晓. 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20]Donald S. Zagoria and Young Kun Kim. North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J]. Asian Survey 15, December, 1975.
- [21]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 [22]Youngnok Koo and Dae-sook Suh, eds,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 [23][法]帕特里克·萨巴捷. 冷战留下来的最后铁丝网[J]. 法国:解放报, 2000-06-13.
- [24]日本防卫研究所. 东亚战略概览:1997-1998[N]. 北京: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8.
- [25]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论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26][韩]金大中. 建设和平与民主[M]. 冯世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 [27]Choong-Nam Kim. Korea-U. S. Alli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Yu-Nam Kim and Hoyt H. Purvis, eds. Seoul and Washington: New Government, New Leadership, New Objectives[C]. Seoul:Seoul Press, 1993.
- [28]Myung Hyun Cho.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 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M]. Seoul: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89.
- [29]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30]高崇云. 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M]. 台北:正中书局, 1989.
- [31][英]杰弗里·帕克.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3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 [33]G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M]. Wheatshaf Books, 1988.
- [3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The Essence of US Policies upon Korean Peninsu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ANG Chuan-jia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its special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sophisticated geographical-political environment, became an essential and crucial part in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US global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 fact, the US policy concern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become a system, which in form appears two connected and interacting layers: one is pointed to the DPRK with the purpose of 'regulating' it and eliminating 'the North Korean menace'; the second is for the surrounding big countries and the purpose is to 'regulate' the relevant countries and to dispel their attempt to gain regional dominance. Just in this sense, we define the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after the cold war as 'double regulation'.

Key Words: US Foreign Policy; The Korean Peninsula; Double Regulation

[责任编辑 李平生]